

学术思想与人物

刘梦溪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学术思想与人物

刘梦溪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思想与人物 / 刘梦溪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1

ISBN 7-5434-5318-5

I. 学... II. 刘...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 ②哲学家—人物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3378 号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监 制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版 /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

开 本 / 880 × 1230 1/32 12.25 印张

出版日期 /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6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第一篇	季羨林先生九十寿序	1
第二篇	“文化神州丧一身”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新释	5
第三篇	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	15
第四篇	王静安先生学行小传	60
第五篇	“中西体用资循诱” ——陈寅恪的文化态度	96
第六篇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	109
第七篇	“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简释	116
第八篇	陈寅恪与《红楼梦》	125
第九篇	义宁之学的渊源与宗主	154
第十篇	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	165

第十一篇	蔡元培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182
第十二篇	熊十力和马一浮	189
第十三篇	冯友兰和“贞元六书”	217
第十四篇	晚清新学叙论	227
第十五篇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241
第十六篇	百年红学说素隐	286
第十七篇	现代性与跨文化沟通 ——史华慈教授访谈录	296
第十八篇	哈佛的中国学与美国的中国学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访谈	339
第十九篇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361
后 序		374

季羨林先生九十寿序

先生九十矣。九乃至大至博至祥至吉之数。谚云：“九九十成。”《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今禹域之内、寰宇之中，凡承学之士，鲜有不知先生之名者。然知先生之名，未必知先生其人。知先生其人，未必知先生之学。知先生其人其学者众，真知先生其人其学者也稀。《礼》：“上公九命为伯。”喻品阶之高也。《语》：“君子有九思。”谓行远不迷也。《诗》：“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以其深泽也。《书》：“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缘方法之多途也。《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见其生徒有繁、嘉惠后学之高情也。《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言风气所凝聚也。盖先生为学品阶之高、行谊之正、泽被之深、进径之广、桃李之众、风气之所凝聚，足为当代上庠学风之嚆矢。

吾国学术晚清为一大变局，五四一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又一变。现代学术之发端并结出果实，即集中于此一时期。美雨欧风，旧邦新命，整厘传统，会融新知，硕儒高学，应运

凤鸣，乾嘉之后，耸立高峰。新学与旧学相斥相继，中学与西学相拒相融，驳杂多变，为此期学术之特异景观。新中有旧，首推绩溪胡先生；旧中有新，莫过海宁王先生。王之凤契托命为义宁陈寅恪先生。而陈、胡均先生之恩师，薪命相传，老而弥笃。王之学由新转旧，所发明在殷周制度暨古器物古文字古史，二重证据，为现代学术奠基；陈之学立足乙部，兼及梵夹道藏，诗史互证，今情古典，成一代通儒之象。王学开辟多，涓滴之续，即可成就。陈学精深兀立，几成绝响，惟我季先生最近义宁，而另有进境。先生东鲁临清人，生孔孟之乡，处奖励游学之世。幼承庭训，已知苦读向学，壮而负笈欧陆，厚植根基，十年艰辛，终于有成。

临清之学，不以传统小学之文字训诂入，而以异域之古文字、稀有文字立，故能独得国际东方显学之专学绝域之入室门径。二十世纪之国际东方显学，曰敦煌学、曰甲骨学、曰印度学、曰蒙古学、曰西夏学、曰藏学、曰现代佛陀之学。因入径至难，均称绝域。敦煌、甲骨吾国学人涉猎者众，绩学者也多。蒙古学胶县柯凤荪先生后，两宁（海宁义宁）继之辨之，再后，吾不知矣。佛学石埭杨仁山、宜黄欧阳竟无、崇德太虚、丹阳吕秋逸四大师学兼仰信，而黄梅汤锡予先生截断众流，自成知识统系，卓然大家，先生固师事之，且以《浮屠与佛》名篇鸣世。惟印度学一科，先生独辟而自立之，故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叹。吾国道咸以降，考史之学以治辽金元史及边疆史地为能事，因缘凑泊，为后续之中土学人切入二十世纪东方显学辟一特殊路径，即中西交通史研究是也。先生固二十

世纪此学此科此一显学之余脉新枝之集大成者，且已开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之先河。

要之先生之学所专精之域区，一曰印度学、中亚古文字学，以其所著《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研究》为代表；二曰九译之学，以所译述之《罗摩衍那》《五卷书》等梵文经典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代表；三曰佛陀之学，以两论《浮屠与佛》、三释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和《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为代表；四曰中西交通史事之学，以《糖史》为代表。故先生所治学，未尝不可视做经史之学，盖梵国异域之经、中西交通之史也。入径亦未曾超离文字训诂之属，为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诸异域稀有文字之训音转注也。而其方法，则辨音知字、转注转译、构筑文化原型。职是之故，称先生为二十世纪中国东方学之重镇、印度古学之泰斗、九译之学之大师、中西交通史之大家，明学之士其谁曰不然欤？

先生之所从事固绝域之学、出世之学也。因以入世之精神为出世之学，遂使所为之出世之学具入世之精神。异域僻典，不觉其冷；转音训字，不病其繁。然先生并不以钩索沉隐于绝学之域自划，犹沛沛然尽有不能放释之入世情怀。故心系家国，每作出位之神思；感时忧世，常鸣旁通之秘响。睹西方势强、国性不立，反对文化霸权，遂倡河西河东之说；因文化劫难、人性泯灭，为回挽人心世道，至有牛棚之记。前年，有私淑之学子请益于先生，云学位候选人资格已获，惟导师不堪师表，如何？先生曰：不妨虚与委蛇，俟通过学位，即弃而去之。先生性平易，望之温，即之也温，晚生后学，可以相亲。深情

积郁，则笔之于文，或文化批评，或散文随笔杂记，七十年如一日，未尝稍辍。文如其人，一本自然。久已卓立于艺苑文坛，浑然而不自知。散文之于先生，乃学之别体，而非学之余事。先生为学不藉时会而得师缘，为人不深求世事以养性气。八十年代末，曾有预闻国政之高请，先生却之。晚年学益醇，思益新，笔益健。平生著书高一丈，八十后所著逾五尺。此固先生之勤、学术之幸，然亦国家之悲也。

陈寅老昔述杨遇夫先生之学于战乱之世曰：“一旦忽易阴森残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人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又何叹哉？又何叹哉。”固寄望于将来、有待于当道者也。若夫临清季先生，执教京师太学已逾半个世纪，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不遗毫发之余力，立足东方，笑对当世，头白年高，青山无梦，不待尊礼，已国老儒宗矣。岂敢述学，九秋颂九，为先生寿。

岁次庚辰九月后学刘梦溪拜撰

（《汉书·贾捐之传》：“越裳氏重九译而献。”颜注引晋灼曰：“远国使来，因九译言语乃通也。”）

〔载《季羨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亦载〕

“文化神州丧一身”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新释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上午十时，一桩震惊世界文化界的事件发生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我国现代学术的开辟者、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以五十一岁的盛年，自杀于颐和园昆明湖之鱼藻轩。中国二十世纪的一颗最灿烂的学术之星，就这样熄灭了。一时说者纷纭，疑案重重。独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襄助乃父推动湖南维新运动的爱国大诗人陈三立的哲嗣、静安先生的国学研究院同事、现代史学巨擘陈寅恪力释众疑，提出殉文化之说。其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写道：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

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又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邴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又说：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又说：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

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齷齪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我全文引述此序，是由于陈寅恪这篇有名的序言不仅对王国维的死因给以正解，同时也是我们解开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之谜团的一把钥匙。当然，就中尤可见出王、陈一代学术大师的文化自觉。

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化者何？社会者何？中国是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文明体国家”，其文明之发轫，有文字记载的可靠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但直到晚清以前，从无所谓“中国文化”之说。中国就是中国，中国当然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硕大无朋的文化包容之象。可是无须用“中国文化”这个“空”概念加以界说。晚周诸子固不必说，即使宋儒之程朱张陆，或盛清学者如戴、阮、二王、章、钱，他们在自己所处时代如果看到“中国文化”四字，也一定瞠目不知所对。只有到了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来了，与之相比较，才有中国文化之说。换言之，“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是晚清知识分子自我反省检讨传统的用语，对中国文化本身而言，是“他”者的叙述。所以上一个百

年，这个概念虽被旋转不停地给以讨论给以解说，而终无结果。以至于晚年的钱锺书先生，与来访的学人开玩笑，说谁再讲东西方文化，我枪毙他（说的时候他拿起一支笔）。这和陈寅恪《挽词序》开头所说“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属同一义谛。

所以然者，是因为通常所讲的文化系泛指。陈寅恪不同，他揭示的是与一定社会结构相连接的基本文化价值，或曰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泛指一切文化现象。我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社会的运转，以国家为中心，以家庭为本位，反映家国伦常秩序的“三纲六纪”，是传统社会的核心文化价值。《挽词序》所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即指此一层意涵而言。《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东汉班固根据章帝招聚官员和儒生在白虎观对《五经》所作讲论辑撰而成。卷八论“三纲六纪”，“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自不待言；“六纪”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与后来的“五伦”互有异同。传统士人所谓“明大义”，就是指知晓这些纲纪伦理而行为上又无所违连。西方国家历史上当然也有君主和臣工，也有家庭和家族，但并没有这种以普遍性形式出现的专门规范君臣家庭各种角色关系的系统道德律令。纲纪之说纯属中国的文化秩序（的确应该叫文化秩序），而且也是社会秩序。因为它是笼罩全社会的一面大网（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职是之故，当社会的经济结构变迁之后，以有形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的经济制度为依托物的文化秩

序，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二十世纪的中国，就处于这种文化与社会剧烈播迁与变化之中。现代学人所热衷的文化上的新旧之争、东西之论、古今之辨，皆缘于此一变化过程。

陈寅恪《挽词序》的过人之处，是指出以纲纪之说为表征的中国主流文化的意义，具有“抽象理想之通性”，也就是柏拉图的所谓理念（Idea）。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完全做到，倒不一定。翻览史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乱况，触目皆是。魏晋时期、宋元市井、明清之际，亦不乏反对纲纪之说的束缚、主张以情抗礼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但整体上，迄于晚清“三纲六纪”的基本文化价值和文化秩序一直得以维持。即使是持无父无君之论的佛教传入中土，也没有动摇这一秩序。原因是“藉之以为寄命”的社会经济制度未变。晚清以降的剧烈变动（陈寅恪称“巨劫奇变”），既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又是文化思想的变迁。简言之，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从此崩塌了。因此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的失落与痛苦，可想而知。王国维就是这样的人。但失落与痛苦，可以有不同的走向。由痛苦而新生，为更多的知识人士所选择。即使未趋步入于新潮，也不必即死。《挽词》“海日尚书互倡酬”句的“海日尚书”，指沈曾植——王国维最服膺的清末大儒，曾出任宣统复辟时学部大臣，对共和共产自不认同，但晚年逍遥海上，平安而终。同为溥仪老师的罗振玉、柯绍忞虽有殉主之约（《挽词》“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指此），但并未践履，没有因一九二四年皇帝被赶出宫而自裁。

然则王国维究竟缘何而死？《挽词序》在强调纲纪之说的

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时候，举出两个例证：“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酈寄亦待之以鲍叔。”读者很容易认为不过是寻常举证，意在说明纲纪的理想远高于现实而已。其实不然。独创解释前人著述须“古典”“今典”并重的陈寅恪先生，论静安之死这样的大事件，岂有虚设例证之理。李煜自是古典，但今典指谁？我以为指溥仪。刚愎无能的溥仪正好与孱弱得“以泪洗面”的李煜为比。然而按纲纪之说，即使是溥仪、李煜这样不中用的“君”，也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使汉室得到“中兴”的光武帝刘秀。很不幸，静安先生对他的“学生”宣统皇帝，就抱有这样的幻想。《挽词》叙述王国维入值南斋，像其海宁同乡、康熙朝掌尚书房的查初白一样勤勉敬谨（“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接下去有句：“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不是讲王国维希望溥仪成为“中兴主”而何？因此“君为李煜”的“君”，必指溥仪无疑。

那么“友为酈寄”的“友”又系何指？不是别人，而是罗振玉。罗王之为友，自无疑问。而王自沉之前，两人交恶，也是不争之事实。历史上管鲍之交的美谈和酈寄卖交的不德，是朋友相交的两个极端的例子。但按传统的纲纪之说，即使友是酈寄这样的不友之人，仍然应待之以鲍叔。王国维就是这样对待罗振玉的。罗王是儿女亲家，晚年交恶，也是因儿女之事所引发。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王之长子、罗的女婿王潜明病逝于上海。静安先生将潜明所遗之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洋银寄给住在天津的罗女，罗振玉以女儿拒收为由欲退回，引起静安

不满，信中致有“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的极强烈的措辞。实际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王国维大半生的学术活动，多得到罗振玉的经济资助，因此一涉及经济问题，王格外敏感。《白虎通》释朋友之纪有言：“货则通而不计。”依王的文化理想，他会感到罗之所为不合于纲纪之说。当然王罗交恶，还有政治观点不合的方面。一九二五年八月罗六十大寿，王祝寿诗有句：“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问题就发生在同为溥仪老师，而对溥仪离宫后的出路，却有不同的预设。这个问题复杂，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不多赘。

总之晚年的王国维越来越认识到，先是逊位尔后又被赶出宫的宣统皇帝溥仪，毕竟不是刘秀，几十年与之相交的罗振玉也不是鲍叔。他失望了，痛苦了。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极端失望；不是寻常的苦痛，而是苦痛得“达极深之度”。寅恪先生说：“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而所以死之故，也不是由于“具体之一人一事”，而是此人此事所代表的“君臣之纲”和“朋友之纪”，即具体之人事反映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想，已彻底破灭，身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因此王国维之死，不是殉清，而是殉为其所化的那种文化、那种文化理想、那种文化精神。

释解至此，难免仍有人会发为疑问：尽管王国维是为传统文化所化的大文化人、大学者，而晚清以还的文化与社会，确是传统价值崩塌的时期，但完全可以在保存自身生命的情况下，使个人（不是社会）的文化精神得以保持，何必一定自陷

绝境？如果以流俗的见解看待问题，则此问的逻辑似难以驳倒。可是陈寅恪先生另有逻辑，且请共赏其洞悉社会与文化变迁底里的惊世骇俗之语：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这段话是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论述元稹思想时所写，直接针对的是中晚唐的社会风习和道德标准的变迁，但其普遍意义适用于任何新旧更替、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代。尤其对知识阶级的“贤不肖拙巧之分别”，其今典之意涵，可延长至今天。而“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不是明显指王国维吗？王之所以死之故，不仅因为晚清以来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毁灭了他的文化理想，也因为求诸个人品质他不是巧于用世的“巧者”，而是“贤者拙者”。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除了《挽词并序》，还有《挽王静安